

读书买书 / 卖书编书 / 评书写书

欧阳文彬, 百岁“女书生”的跌宕人生

“

3月19日,新闻文化界耆宿欧阳文彬在沪逝世,享年102岁。她一生奋斗、笔耕不辍,兼具多重身份:是抗战时期参与过抗日宣传与地下斗争的老党员;也是编辑出版领域德高望重的“老三联”;还是获“从事文学创作60年”纪念章的中国作家协会会员……晚年她曾想创作一本记录自己人生的文学性自传,取名《一生都在风浪中》。书虽未能成稿,但这七个字确实概括了她跌宕起伏而百折不挠的一生。

◆ 实习生 陶胡韵



欧阳文彬与叶圣陶在一起



上世纪50年代欧阳文彬在《新民晚报》办公(赵超构摄)

年出生于美国。这年夏天,父母带着襁褓中的欧阳文彬回到中国,但归国后父亲未能顺利解除家中安排的包办婚姻。母亲欧阳骏是位性格刚硬的女权主义者,即便对欧阳的父亲仍有爱意,仍决绝地与其分开,誓不做小妾,此后终身未嫁,独自抚养欧阳文彬与其妹陈岚(原名欧阳鑫)。欧阳骏坚信男女应当平等,男人能做的事,女人也能做。她常作男装打扮,一头短发,也令毛毛(欧阳文彬乳名)和妹妹穿着男式短衫短裤,且让姐妹二人称她为“爸爸”。欧阳文彬一生要强,事事力求完美,这种性格的形成恐怕正是深受母亲的影响。母亲一度身居高位却中年失业,性情大变,抽烟喝酒日甚一日,最终于1956年罹患肝癌逝世。

欧阳文彬曾有过一段婚姻,却在35岁那年与丈夫分道扬镳,个中缘由复杂,而其中一点是丈夫忍受不了她“鸡叫出门、鬼叫未归”的工作狂状态,曾扬言“我是娶老婆,不是娶干部”。为了工作,自己确实无暇顾及家庭,这一点亦为欧阳文彬所认同。欧阳文彬领养有一女,但女儿与她长期失和,并未给予太多陪伴与慰藉。

与父亲未曾谋面,中年丧母,而又孑然一身地度过多年,欧阳文彬在亲情方面留下了很多遗憾。所幸她的一生中邂逅了诸多良师益友,正如她自己所说:“我爱朋友,重友情。由于父母早年分手,我没有得到过父爱,也没有呵护我的兄长,但从几位革命前辈和文化长者那里获得了胜似父兄的关爱。我中年离异,独自拼搏,靠的是朋友们的策励和帮助。”就读民国学院时,著名作家张天翼引领她进入文学创作的殿堂。重庆遇险后,出版家叶圣陶招纳她进入开明书店并言传身教,她与叶至善、叶至诚两兄弟亦成为至交好友……晚年她眼疾严重,需佩戴助听器,幸有保姆范阿姨悉心照料,辅助她使用电脑,又有几位文化出版界的“小友”协助她口述资料、整理文集。80多岁学唱京剧后,诸多忘年之交的票友们欢聚在欧阳文彬番禺路的小小公寓里,一同唱念做打,好不快哉。

欧阳文彬一生从读书、买书,到卖书、编书,再到评书、写书,一路从书林中跋涉而来,其间风浪无数,而她自岿然不动。这份不被磨灭的坚毅,为文坛留下佳话,亦为后人提供借鉴。

烽火连天,圆梦新知书店

欧阳文彬的母亲欧阳骏是哥伦比亚大学的教育学硕士,归国后亦投身教育界。受母亲的倡导,欧阳文彬两岁起就与书结缘,尚在“大字不识几个”的时候,她就能捧着连环画一坐几个小时,看得津津有味。

小学二年级时,欧阳文彬在《儿童志愿调查表》上用稚气歪斜的字迹写下“长大要当书店店员”,令老师倍感讶异:“别的小朋友要做文学家,要做科学家,或者要做老师,你要做书店店员干什么?”年幼的欧阳文彬只是觉得“书店里书多,可以让我看个够。”

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,欧阳的求学生涯屡受影响:本考上东吴大学,但因苏州告急而未能入学。欧阳与母亲、妹妹逃亡到家乡湖南投亲靠友,后辗转转入读南迁至长沙的北平民国学院。也是在民国学院就读期间,她受到徐特立、世界语老师陈新(陈世德)等的影响,于1938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。同年秋冬,民国学院因长沙吃紧又将迁往湘西,欧阳于此时辍学。

“长沙大火”后,欧阳仓促逃难,死里逃生后参加了九战区政治部政工大队流动宣传队。国难中面对国民党当局的迫害,欧阳文彬与队友们只得按上级指示暂时离队,自谋职业。出路在何方?——托病请长假回乡、暂住零陵家中的欧阳

文彬伤透了脑筋。

此时,《救亡日报》上刊登的一则启事吸引了欧阳文彬的注意——桂林新知书店招考店员和练习生。局势开明的桂林文化城与出版进步书籍的新知书店,对欧阳充满了吸引力,于是她即刻启程。没钱买火车票,她凭着一身军装和离队时带走的差假证免费搭乘来到桂林。时任新知书店总经理的徐雪寒接待了欧阳文彬,问清来意和情况后让她留下地址以便考期定后通知参加考试。欧阳文彬直言:“我在桂林人生地不熟,哪有地址可留?”当时她所带行囊也只有一个寄放在汤团店的背包。徐雪寒最终留欧阳在书店暂住,等门市部打烊后可以睡在陈列书籍的台子上,这才令她有了栖身之所。

此后的日子里,欧阳文彬主动在门市部帮忙干零活,也跟着日渐相熟的店员到太平路宿舍里“吃白食”,慢慢和店内同人成为了“自己人”。等到报考截止时,徐雪寒交给欧阳两项任务:试拟考题、接待考生。欧阳出的考题最终得到了徐雪寒的认可,也使她未经考试就被录取为正式店员。小学二年级时的梦想,在战火纷飞年代里通过执著求索成为了现实。

欧阳文彬因爱书而投身书业,却在进入新知后领悟到“进书店工作,不是为了自己有书看,而是要让大家有书看,更重要的是让大家

有好看书”。她很快适应了繁重工作的压力,熟悉了编辑、出版、发行、总务四部门的工作。

因祸得福,开拓写作体裁

1953年,《新民晚报》改为公私合营前,时任市委宣传部报刊处干部的欧阳文彬受组织委派,任公方代表。《新民晚报》完成公私合营后,赵超构任社长兼总编辑,欧阳文彬任副总编辑兼党支部书记,分管副刊和文化新闻。欧阳文彬佩服赵超构杂文写得极好,敬重他办报有经验,他们在工作上配合默契,私交亦甚笃。两人联手挽救了《新民晚报》的低迷销量,在“短些、广些、软些”的口号和改版措施的多次推行之下,1956年九十月间,晚报销量从二、三万增加到八、九万份,达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最高记录。

然而,在1957年反右派斗争和党内整风中,欧阳被错误地受到批判,降职降薪。这给欧阳文彬的政治前途蒙上一层阴影,打击不可谓不沉重,后续的工作安排也成了问题。此时,在赵超构的授意下,欧阳文彬成为报纸的“撰述员”,专门负责为文艺版撰写三评(书评、影评、剧评),从此开启了她的文艺评论生涯。晚年回望这段经历时,欧阳文彬乐观地说道:“生活向下看,看看生活条件不如我的人多的是,我的心态就平和了。现在倒过来看,我因祸得福,因为写三评文章,

一不小心,让我成了作家。”

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和粉碎“四人帮”后的新时期文学繁荣年代,欧阳文彬撰写了不少有深度、有分量的文学评论文章。作为一名文艺评论家的欧阳常怀揣着惜才之心,对初露头角的文学青年多有提携,诚如她自己所言:“主要是推荐新人新作,很少评论名家已有影响的作品。”

而在耳顺之年,欧阳文彬又从评论转向创作,写起了长篇小说。处女作《在密密的书林里》取材自她的真实经历,展现了地下党领导的进步书店开展斗争的种种状况。“60岁学吹打,甘苦自知”,不论是素材的裁剪取舍,还是故事的讲述方式,都令欧阳耗费了诸多心血。过程中她与合著者费三金反复推敲打磨种种细节,面对这位刚过而立之年的“小费”耿直的建议,欧阳往往乐于倾听、采纳。该书在1981年出版后成为当年国内十大畅销书之一,亦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中连播。此后二人又合写了姐妹篇《幕,在硝烟中拉开》,同样收获好评,荣获解放军文艺出版社“1977-1986年优秀长篇小说奖”。

亲缘淡薄,幸得良师益友

欧阳文彬的父母都是“庚子赔款”留学生,二人相识、相恋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,欧阳文彬于1920